



汪润 著

# “夺取汉学中心” 的理念与实践

——以《辅仁学志》为中心

學苑出版社

# “夺取汉学中心”的 理念与实践

——以《辅仁学志》为中心

汪 润 著

學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与实践：以《辅仁学志》为中心/  
汪润著.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077-5276-2

I. ①夺… II. ①汪… III. ①汉学-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国  
IV. ①K207. 8 ②G3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6934 号

责任编辑：沈 萌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mailto: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营销部）、010-67603091（总编室）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880×1230 1/32

印 张：9.5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5.00 元

# 目 录

绪论 .....	( 1 )
第一章 学术机构的建立：从“辅仁社”到《辅仁学志》	
创刊 (1912—1928) .....	( 23 )
第一节 “辅仁社”的学术特色 .....	( 25 )
第二节 学术阵地的建立：《辅仁学志》	
创刊 .....	( 57 )
第三节 中西兼备取向的两种体现 .....	( 79 )
第二章 西方学术的引入 (1928—1937) .....	
第一节 中西会通：历史类论文的	
中西交流选题 .....	( 103 )
第二节 引入西法：语言文学研究的	
科学化 .....	( 125 )
第三节 北大、清华和中研院的西学引入与	
辅仁大学的学术取向比较 .....	( 135 )
第三章 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科学化	
(1937—1945) .....	( 149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升华：	
	史源学	(151)
第二节	跨学科的方法借鉴：语言	
	文学研究的新方法	(172)
第三节	陈垣史学方法的总结：	
	《通鉴胡注表微》	(191)
第四章	“夺取汉学中心”的余绪 (1945—1948)	(207)
第一节	传统乾嘉考证方法的余音	(209)
第二节	史学新方法的应用	(223)
第三节	海外汉学家的融入	(235)
第四节	未竟的事业：“夺取汉学中心”的成绩与遗憾	(242)
	结论：“夺取汉学中心”的理念与时代思潮	(251)
附录：	《辅仁学志》目录	(257)
参考文献		(272)

## 绪 论

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数学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领域中，数学方法的应用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在某些领域中，数学的应用还不够广泛，或者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将对这些领域进行探讨，以期为数学的应用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首先，我们来谈谈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科学，而运动规律可以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因此，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是十分广泛的。例如，在经典力学中，牛顿定律可以用微分方程来表示；在量子力学中，薛定谔方程可以用复数来表示。此外，统计力学、热力学等领域的理论也都是建立在数学基础之上的。

其次，我们来谈谈数学在工程学中的应用。工程学是研究如何利用自然规律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在工程学中，数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数学模型来预测工程系统的性能；二是通过数学方法来优化工程设计；三是通过数学方法来解决工程中的各种计算问题。例如，在土木工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预测桥梁的稳定性；在机械工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来优化零件的形状；在电气工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方法来解决电路分析等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学科建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阶段，是现代学术机构和现代学术的兴起阶段。本书着重分析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脉络。笔者希望能够以此为个案，管窥当时的学术风气与学术动向。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作为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sup>①</sup>经常被与中国近代的其他十几所教会大学并提。<sup>②</sup>但实际上，它们不能等量齐观，情况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由于辅仁大学是民国初年屈指可数的由天主教建立的大学，而且还在于中国学者在它的创立和办学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辅仁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其办学的根本宗旨是“发展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sup>③</sup>这样的办学宗旨和目的不仅体现在对“国学”和社会科学课程教育的重视，更体现在从教员聘任到学术建设的多个方面。学校聘请了很多著名中国学者，其中国学家沈兼士任文学院

① 本书中辅仁大学是指北京辅仁大学。

②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通常是指13所新教教会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之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三所天主教大学（震旦大学、辅仁大学、津沽大学）。

③ 图沫：《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院长，中国语言文学家刘复（半农）任教务长，张星烺任史学系主任，此外还有张怀、朱希祖、郭家声、朱师辙、尹炎武、余嘉锡、马衡、范文澜，等等。这样强大的学术队伍在当时国内是不多见的，而这些学者很多都是《辅仁学志》的编辑和作者。

辅仁大学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主办的学术刊物《辅仁学志》更是反映了当时的学术风气和治学特色。《辅仁学志》自1928年12月创刊，至1947年12月停刊，共经历了20年之久。在陈垣、沈兼士、张星烺和余嘉锡等人的带领下，《辅仁学志》在20年中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既重视传统中国文史文化精华，又吸收西方研究方法，以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强调乾嘉考据和欧洲史学方法相结合。它所倡导的中西交通史、宗教史、民族史等研究领域的视角与方法，被继承下来，成为今天很多研究领域的发端。

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术群体，但是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是当时学界就存在的看法。1943年，日本学者今崛诚二在《东洋史研究》第八卷第5、6期合刊上发表的《今日北平学界》一文中说：“辅仁大学陈垣校长犹健在。继续于论文专著。作超人之活跃。其所论对于现代深刻烦恼中，更加一层悲怆！如《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其最著也。氏高足余逊、叶德禄、赵光贤、柴德赓等青年讲师，各就汉唐宋明时代追随陈垣，作成一种学风，殊为壮观。该校除继续出版《辅仁学志》《华裔学志》外，去年度复新刊《民俗学志》，内容充实，大有与最近昆明方面斯学相竞之意。惟今春文学院长沈兼士失踪，某有力教授被捕。张星烺、梁启

雄、朱师辙等长久沉默，不知何故。”<sup>①</sup> 这说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即使是日本学界，对以陈垣为中心的辅仁学者们也是有几分折服的；其次，辅仁大学培养的青年讲师追随陈垣，形成学术梯队，是一个学术团体，并且有自己的“学风”；再次，文中提到《辅仁学志》等刊物的继续出版，是学术发展的标志；最后，所述的教师沉默自然是明知故问，当时日本侵华，北平沦陷，学术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压制。今崛诚二站在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之外，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这一群体，强调了以陈垣为领导的学术群体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同时，他又指出辅仁学者群体可以与“昆明方面”学术相竞，这不仅强调了辅仁学者群体的学术地位举足轻重，也说明具体地把握这一群体的学术取向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学术整体发展方向。

对《辅仁学志》进行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刊物的出版发行史的问题，而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的问题。重温了《辅仁学志》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后，我们就会更清楚地明白中国现在很多学派的缘起，也可以更好地展望学术发展的未来走向。总之，《辅仁学志》不仅充分反映了辅仁大学的治学方向，而且也是整个近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近现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以《辅仁学志》为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场），透视辅仁大学这一学术机构，并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这是十分有意义的尝试。

---

<sup>①</sup> [日]今崛诚二：《今日北平学界》，《东洋史研究》1943年第5—6期，转引自刘乃和：《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册）》，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501页。

## 二、研究状况

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才能真正确立学术研究的坐标，也只有尊重前人的学术努力，才能相应地在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笔者也希望通过简单的学术回顾，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本书将以“夺取汉学中心”为线索展开讨论。这一思想是由陈垣阐发的，但最早在学术史中将其整理分析的学者是陈述。他在《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中也记道：“我听援庵先生说此话是1929年在师大，郑先生听说是1921年在北大，翁先生听说是在燕大。可见援庵先生当年曾广泛号召，鼓励青年们要面向国外，和国外的中国史研究争高低。几十年来，在援庵先生的号召下，他的学生们（包括再传的、私淑的）勤奋钻研，在史学的各个方面，有些已接近、赶上，或者超过法国、日本的，当然与援庵先生的提倡、号召勉励是分不开的。”<sup>①</sup> 虽然只有几句话，但他第一次把“夺取汉学中心”的提法做了总结，并肯定了它的作用。同样有着敏锐学术目光的是刘乃和。她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整理了陈垣的几次关于“夺取汉学中心”的不同表述，同时也做了这样的评价：“那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政府的腐败、卖国，造成了中国的贫弱。还不懂得

<sup>①</sup> 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陈智超编：《励耘书屋学问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27页。

那时想要在史学研究上超过外国，简直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刘乃和的分析是深刻的。她认为“夺取汉学中心”是当时以陈垣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共同的夙愿，但是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却仍然没有实现。这不仅要从学术脉络内部去分析，也要结合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才能更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发展变化。罗志田、桑兵、王汎森、王晴佳和陈以爱在研究这一时期学术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陈垣的“夺取汉学中心”的主张，但都没有展开讨论。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界对于这一思想已经有所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具体的研究还很薄弱。

简而言之，以往的学者只是把陈垣的“夺取汉学中心”这一说法，当作是一种当时学者之间的谈论或者提法，最多也只是 一时的口号，而没有任何人对“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一句话的理论内涵、实践方法、影响与效果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夺取汉学中心”至少有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值得深思：一、它反映了当时一批学者的共同愿望，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确实有一批学者和学生受其感召，走上了学术之路。易言之，它充当了学术阵地口号的作用。二、从谁手中“夺取汉学中心”？这隐含了一个“对手方”，就是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汉学研究。这使得陈垣和他的弟子们在研究中始终是放眼世界的，与欧洲和日本的学者一决高下的同时，也必然要理解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题目也多涉及中西交通史。所以说，这就奠定了辅仁大学和《辅仁学志》的学风，即中西兼备。三、想成为“汉学中

<sup>①</sup> 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88页。

心”，不仅是研究的汇集点，同时也是学术的阵地和学科发展的摇篮，就必须也是机构意义上的“中心”。想要传承学术，在世界上有发言权，就必须有学术阵地，包括学校、刊物和组织机构。因此，可以把《辅仁学志》看作是“夺取汉学中心”的阵地保障。四、如刘乃和所说，在全国积贫积弱的时候，救亡图存、保国保族是首要的任务，全面超越国外的汉学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注定了“夺取汉学中心”是从口号到实践虽然可以进行，但无法实现的结局。五、更深一步思考，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情绪是广泛的，但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以陈垣为中心的这批学者们，并没有停留在民族主义的范围下，而是切实地发表了世界公认的学术著作。那么，在“夺取汉学中心”的感召下，从有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抒发救亡图存、家国沦丧的情绪的影子，也是很正常的。不能把“夺取汉学中心”简单地等同于民族主义的情绪化表现。

对于《辅仁学志》的研究并不多见，笔者目及所限，仅有张越教授的《记〈辅仁学志〉》<sup>①</sup>一文，全文不过6000字，对《辅仁学志》进行了大线条、多方位的描述，受字数所限，内容观点都没有进一步展开详论。虽然对《辅仁学志》本身的研究很少，但对其相关的领域则有较多的研究，笔者将对《辅仁学志》中涉及的中西交通史等方面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对以往近现代学术研究常用的“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分类方法简单回顾，提出置疑。

《辅仁学志》由辅仁大学的文、史两系主办，史学部分主要

<sup>①</sup> 张越：《记〈辅仁学志〉》，《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8—52页。

得惠于陈垣和张星烺先生的史学理路。所以，中西交通史成为学志所发文章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就笔者所见，尚未有专以辅仁大学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专著出版。最早回顾“中西交通史”的是方豪，他发表于《华学月刊》的《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对民初以来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成就作了简要的概述。<sup>①</sup> 1983年，张维华撰《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就其研究范围和对象、前人研究的成就和不足做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并提出了改进意见。<sup>②</sup> 1992年台湾学者李东华发表的《怀援庵与亮尘，念觉明与杰人——略论民国以来国人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以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四大学者为重点，就中西交通史的缘起、研究范围、名称的合理性及研究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sup>③</sup> 1996年，陈高华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状况作了简要的回顾，并从资料整理、工具书的编纂、文物考古、翻译、专门研究等几个方面，对其成就加以综述。<sup>④</sup> 仅以对陈垣、张星烺、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为例，有芦苇的《我

---

① 方豪：《六十年来之中西交通史》，《华学月刊》1974年第1期，第31—46页。

② 张维华：《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1期，第3—9页。

③ 该文最初发表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组，1992年）中，后收入作者编著的《方豪先生年谱》，台北：台湾国史馆编印，2000年。

④ 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10—124页。

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sup>①</sup>、张铁伟的《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始人——张星烺》<sup>②</sup>、王东平的《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sup>③</sup>、李东华的《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sup>④</sup>等。

此外，还有修彩波的博士论文《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以陈垣、张星烺、冯承钧、向达和方豪五人为专题，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并对几位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比较，希望反映中西交通史的整体面貌。<sup>⑤</sup> 应该承认，修彩波博士的想法和出发点很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缺乏对他们五人及更多学者相互学术关系的考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仍然无法通过他的文章对整体学术发展有所把握。

就《辅仁学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而言，所涉及的领域绝不仅仅是中西交通史，还包括音韵训诂、文献目录等很多方面。中西交通史只是其中比较明显，且有较多研究论著的领域之一。现在还没有论著能够把它们与中西交通史结合起来。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也需要辅仁大学和《辅仁学志》这样的一个个案。不

<sup>①</sup> 芦苇：《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拓荒者》，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1990年江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sup>②</sup> 张铁伟：《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始人——张星烺》，《西亚非洲》1983年第5期。

<sup>③</sup> 王东平：《张星烺先生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9—15页。

<sup>④</sup> 李东华：《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研究》，《“七十年来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以辅仁大学为中心”学术讨论会文集》，台北：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2000年。

<sup>⑤</sup> 修彩波：《近代学人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是研究一个一个的学者著作，而是将他们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进行研究，考察他们的学术交往过程，考察学术著作的产生过程。现有的中西交通史的史学史研究，还没有考虑到为什么在民国时期，同时兴起了那么多文史学术流派，中西交通史和其他领域流派是在什么土壤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总之，就是现有研究没能做到全局视野，不能看到学科间的比较与互进，不能发现不同学者群体的协调发展。那么，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是如何交流，他们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呢？这就是笔者要考察的问题。中西交通史只是《辅仁学志》的一个重要内容，但笔者是要考察整个以《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的研究取向问题。实际上，如果把它们放入整个近现代学术思潮中，就会发现不论是中西交通史还是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研究取向，那就是“夺取汉学中心”的努力。学者们都频繁地与国外学者进行对话，从自己的学术领域发挥中西兼备的长处，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进行整体把握，既从整体学术脉络看《辅仁学志》，又从《辅仁学志》的学术表现反观学术史的研究问题。

学术界长期以来用“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区分来理解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最早用“史料派”和“史观派”分类法的是周予同。1936年，他的《治经与治史》一文中就出现了“放眼中国现代的史学界，大致可分为二大派：一可称为‘史料派’，注意于史料的搜集与这里；一可称为‘史观派’，根据旧的或新的史料，对于中国史的全部或某一部门加以考证、编纂与

解释。”<sup>①</sup> 而周予同更重视的是“史观派”，他将“史观派”又分为新旧两派，旧派称为“儒教史观派”，新派叫作“超儒教史观派”。1941年，他又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仍然延续了这一分析方法。他说：“所谓转变期的新史学，可分为两类：一是偏重‘史观’及‘史法’方面的，一是专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于史观，或与史观有密切的关系；为行文简便起见，前者可称为‘史观派’，后者可称为‘史料派’。换言之，中国现代的新史学家可归纳为两类，即‘史观派’与‘史料派’。”<sup>②</sup> 周予同以此来做当时史学界的区分，是来源于他对经学的研究。他将经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学派归纳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进而将这样的二分法发展应用于当时的史学现状研究。

许冠三继承了周予同这样的分法，只是更详细地又将“史料派”分为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派”整体上仍然是周予同的分法。<sup>③</sup> 王学典在《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一书中更是以“史料派”和“史观派”作为学术分类的方法。<sup>④</sup> 2004年，王学典在《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中，则将这样的

<sup>①</sup> 周予同：《治经与治史》，周予同、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24—625页。

<sup>②</sup>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5页。

<sup>③</sup>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sup>④</sup>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

分类法引申到了当代。<sup>①</sup>

可见，至今学术界仍然以“史料派”和“史观派”的对立作为学派的分类依据。然而对所谓的学派的整体研究取向和学派内部的个人的研究路数都缺乏具体而深入的个案研究。笔者希望以《辅仁学志》为中心，重新探讨近代学术史的分类方法，对“史料派”和“史观派”的二分法提出质疑。首先，“史料派”和“史观派”的二分法是从经学引申到对史学学派的理解，带有简单化和抽象化的问题。笔者希望回归历史史实本身，通过个案揭示学者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其次，这种二分法的实质是历史哲学层面上的“史料与理论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它直接牵扯的是历史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每一个具体的学者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甚至相同的历史观也可能导致不同的方法论。所以，笔者在分析研究学者群体学术趋向的同时，注重不同时期、不同学术渊源下的具体的代表人物的思想观念，挖掘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再次，这种分类法不属于历史学取向，而是哲学取向。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去思考当时的人如何想当时事，做当时事。例如，以陈垣和《辅仁学志》为中心的学者群体虽然强调乾嘉实证传统，但几乎每位学者背后都有自身的学术脉络和理论。而更进一步考察后，笔者发现学者群体的确从私人交往、学术旨趣、学术资源共享等方面都有着频繁的互动。笔者认为逐一地研究这种历史上切实存在的学术共同体，比用“史料派”更具体，也更反映历史真实。最后，“史料

<sup>①</sup>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65—190页。